

救亡图存与民生维艰：抗战时期滇西难民救助的多维审视（1937-1945）

郭秀

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云南芒市，678400；

摘要：抗战时期，云南滇西地区作为中国西南门户，承担了重要的战略任务，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和社会重构。由于战争、社会经济结构破坏、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滇西地区难民数量剧增，社会经济秩序陷入混乱。地方政府、社会组织、国际社会和外国政府等采取了多种措施开展难民救助工作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难民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，并为边疆难民救助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途径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。

关键词：抗战时期；滇西地区；难民；救助

DOI：10.69979/3029-2700.25.04.056

1 抗战时期滇西地区难民概况

抗战时期，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和国内防线的收缩，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，大量难民被迫西迁。滇西地区难民问题尤为突出，据史料记载，滇西难民主要来源于战区内迁、日军对云南的空袭以及滇西沦陷所产生的本籍难民。从籍贯看，滇西地区的外籍难民主要来自战区，抗战初期，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等地的难民人数相对较多，南京、湖北、河北等地次之，其他省份较少。例如，云南省赈济会1939年（民国二十八年）度对难民籍贯的统计中，清晰体现了这一分布特点。豫湘桂战役爆发后，粤籍难民人数骤增，外籍难民籍贯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但总体上仍以战区难民为主。随着战争的推进，滇西本籍难民因日军的空袭和滇西的沦陷，人数不断增加，到后来本籍难民人数远超外籍难民人数。这些难民中，青壮年占比较高，男性多于女性，且多数难民缺乏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，急需社会救济。

2 滇西地区难民产生的根源

2.1 战争的直接影响

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，不断从东北、华北等地持续侵略，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，迫使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，再从武汉迁至重庆。云南的战略地位随之提升，大量国际援助物资只能通过缅甸经滇西供应。滇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，东临四川，南接缅甸，是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，也是日军进攻中国内地的重要通道之一。控制滇西对于保卫中国西南地

区的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。因此，滇西地区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伤亡，在日军的不断侵略下，社会动荡和人口流离加剧，大量居民被迫离开家园，成为难民。日军占领芒市后，龙陵人遥望芒市大火，开始逃亡，“难民、华侨、散兵或步行，或乘车，争先恐后向保山方向逃难。啼哭呼号之声不绝于耳。”^[1]关于难民数量的统计，因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撑，学界长期以来没有达成共识。据陈达统计，“七七事变”后短短数年中，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；陈彩章认为大后方除有组织的迁移人口外，仅难民就收容了1千余万人；而陆仰渊认为迁移人口多达5千万^[2]；孙艳魁更认为总数当在6000万人，占当时中国4.5亿人口的15%以上^[3]。总之，因受战争的影响，全国难民数量巨大，不下千万。

2.2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破坏

滇西地区在抗战前主要以农业为主，手工业和商业相对落后。抗战爆发后，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东部和中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，切断了滇西与内地的经济联系。滇西地区原本依赖内地供应的物资和商品变得极度匮乏，物价飞涨，经济陷入困境。据《云南省志》记载，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滇西地区的物价指数在短短两年内上涨了数倍。粮食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飙升，普通民众难以承受。1941年12月云南的民国日报内容：“上等白米（每公石）国币230元，中等白米（每公石）210元，次等白米（每公石）280元”^[4]。可见昆明地区大米价格已经是1939年11月的4倍还多。同时，日军

对滇西地区的轰炸和破坏，使得农田、房屋、道路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，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。据统计，1940 年至 1942 年间，滇西地区的粮食产量下降了约 30%，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计，被迫逃离家园，成为难民。

随着战争的持续，滇西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，大量军队、政府机关、学校和企业迁入该地区。然而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并未带来经济的繁荣，反而加剧了资源的紧张和社会的不稳定。滇西地区原本人口稀少，基础设施薄弱，难以承受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涌入。除了昆明地区涌入大量外地人员外，滇西的大理也是难民的安身选择之地，“大理为滇西过往军人及物资的中转站，难民纷纷涌入，乞丐和孤儿，散兵成群结队，社会秩序混乱”^[5]。《滇西抗战史料汇编》记载，1942 年至 1945 年间，滇西地区的人口增加了约 50 万，其中大部分是难民和迁入的军队、政府人员。这些人口的涌入使得原本就紧张的粮食、住房等资源更加匮乏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严重冲击了地区社会资源的配置和供给。大量难民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四处流亡，形成了大规模的难民潮。

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和人口的大量流动，直接导致了滇西地区社会秩序混乱。大量难民为了生存，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获取资源，偷盗、抢劫等犯罪行为频发。同时，由于政府机构迁入和大量军队驻扎，滇西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陷入了混乱，难以有效维持社会秩序。据《滇西抗战时期的治安状况》记载，1943 年滇西地区的犯罪率比战前上升了约 200%，其中大部分案件与难民有关。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维持秩序，但由于资源有限，效果并不明显。社会秩序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困境，许多人被迫再次流亡，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基于以上原因，滇西地区的难民数量随着抗战的加剧在不断扩大。《云南省抗战时期难民统计》数据显示，1937 年滇西地区的难民数量约为 10 万人，而到 1945 年抗战结束时，这一数字已上升至 50 万人以上。这些难民中，既有本地因战争失去家园的农民，也有从东部和中部逃难而来的百姓。难民的增加不仅给滇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，也使得该地区的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等社会事业受到严重冲击。难民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，许多人因饥饿、疾病而死亡，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。

2.3 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恶化

抗战时期滇西地区自然灾害不断，多为水灾、旱灾和地震，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。滇西

地区地处横断山脉，河流纵横，雨季时极易发生洪涝灾害，而旱季则常常面临严重的干旱。滇西位于地震活跃带，地震灾害时有发生。根据《云南省志·自然灾害卷》记载，1937 年至 1945 年间，滇西地区共发生了 20 余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，尤其是 1941 年和 1943 年的特大洪灾，导致澜沧江、怒江流域的大片农田被淹，房屋倒塌，数万人无家可归。这些自然灾害不仅直接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，还导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，进一步加剧了难民的产生。据统计，1941 年至 1943 年间，滇西地区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幅度高达 40% 以上，许多农民因无法维持生计而被迫逃离家园，成为难民。

滇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战争和人为活动而急剧恶化。首先，为了支援抗战，滇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矿产资源开采，以满足军事和工业需求。大规模的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加剧，甚至连河道边的树木也被砍伐，导致河道塌方，土地荒漠化加剧。其次，战争期间，滇西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后方，大量军队和难民的涌入，使得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了更大的压力。《滇西抗战时期生态环境调查报告》记载，1937 年至 1945 年间，滇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战前的 40% 下降至 25% 左右。水土流失导致农田肥力下降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。此外，由于战争需要，滇西地区的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，导致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，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。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使得农业生产难以维继，还导致了许多地区的饮用水源受到污染，居民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。许多村庄因环境恶化而无法居住，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成为难民。随着战争的持续，滇西地区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，直接导致了滇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崩溃和难民数量的激增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，物价飞涨；许多地区居住条件变得极为恶劣，不适合居住，不得不逃离家园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。

3 滇西地区难民的救助工作

面临滇西地区大量的难民，国民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逐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救助政策。1937 年，国民政府成立了“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”，统筹全国难民救助工作；1938 年设立“中央赈济委员会”开始在武汉办公，随之出台了多个救济规章制度；1939 年先后成立省级赈济委员会 23 个，市县各级 1143 个^[6]。滇西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，难民问题尤为突出，因此成为政府救助的重点区域之一。《云南省志·民政卷》记载，

1938年，云南省政府成立了“滇西难民救济总会”，负责协调各地的难民救助工作。1942年5月1日下关分站成立开始办公，1943年7月1日保山分站建成，形成了覆盖滇西主要地区的救助网络。由昆明总站、省民政厅、赈济会共同草拟了《救济腾龙战区难民实施办法》，指导滇西难民救助工作。

3.1 政府的救助措施

一是实施难民收容与安置。国民政府设立了大量的难民收容所和临时安置点，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。1937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《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》，明确规定了难民收容建立的办法；1942年8月19日又颁布了《修正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》，规定：“凡战事发生地点，赈济委员会应派员会同省市县人民政府及驻军，办理抢救事宜，但战事剧烈地点，赈济委员会不能前往工作时，得委托军队相机办理。”^[7]明确了地方政府和当地驻军具有救济难民的义务和责任。《滇西抗战时期救济工作报告》统计，1938年至1945年间，滇西地区共设立了超过100个难民收容所，收容难民总数达20余万人。这些收容所主要分布在保山、大理、丽江等相对安全的地区，为难民提供临时住所、食物和基本医疗。

二是多方筹措粮食供应与救济。粮食短缺是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。云南地区随着抗战的持续，尤其是大量难民迁入，粮食极度紧张。政府通过调拨粮食、发放救济粮等方式，试图缓解难民的饥饿问题。《云南省粮食局档案》记载，1940年至1945年间，滇西地区共发放救济粮约50万石，受益难民超过30万人。此外，政府还鼓励当地居民和富户捐粮捐物，支持难民救助工作。

三是医疗救助与防疫。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疾病流行，难民的健康状况堪忧，政府在难民收容所设立了临时医疗站，为难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。日军还投放了细菌弹，致使滇西地区霍乱和鼠疫横行蔓延，李根源为揭露日军惨无人道的“细菌战”写道：“兽机肆虐之后三日，城乡各处发现霍乱。”鉴于滇西地区霍乱流行，前线指挥官宋希濂将军与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，“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，派出大部分军医人员为居民注射防疫针。”

^[8] 《滇西抗战时期卫生工作报告》记载，1942年至1945年间，滇西地区共接种疫苗超过10万人次，有效控制

了霍乱、疟疾等传染病的传播。

3.2 社会组织的参与

一是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。中国红十字会是抗战时期滇西地区难民救助的重要力量之一。红十字会以其国际性和中立性，在战争环境中能够相对自由地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。云南红十字会成立于1914年，发展到1924年分别设立昭通分会和昆明分会，后来又成立了大理分会。1942年，滇西战役爆发后，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在保山、大理、腾冲等地设立了临时医院和救助站，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。根据《中国红十字会滇西抗战救援报告》记载，1942年至1945年间，红十字会在滇西地区共设立了15所临时医院，收治伤病难民超过5万人次。此外，红十字会还组织了多支医疗队，深入难民营和乡村，为难民提供疫苗接种、疾病治疗和卫生教育。例如，1943年，红十字会在保山地区开展的霍乱疫苗接种行动，成功遏制了疫情的蔓延，挽救了数千难民的生命。除了政府外，许多社会组织和慈善机构也积极参与到难民救助工作中，为难民提供食物、衣物和医疗服务。

二是慈善团体的积极行动。抗战期间，许多慈善团体也积极参与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工作。这些团体包括本地的慈善会、外地的救济组织以及海外华侨团体等。他们通过募捐、物资调配和直接救助等方式，为难民提供了重要支持。1943年，由海外华侨组成的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向滇西地区捐赠了大量粮食、药品和衣物。《滇西抗战时期慈善团体工作报告》统计，1942年至1945年间，滇西地区共接收慈善团体捐赠的粮食约20万斤，药品价值超过50万元。这些物资通过各地的慈善会分发到难民手中，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压力。此外，本地的慈善团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例如，保山地区的“滇西慈善会”在1942年滇西战役后，迅速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，为难民提供食物、饮水和临时住所。据统计，该慈善会在1942年至1945年间，共救助难民超过2万人。

三是教会组织的慈善救助。滇西地区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，抗战期间，教会组织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工作。中华基督教徒联合会难童教养院，是中华基督教徒联合会云南分会组织建立的，主要负责：教养因战而失养之儿童，以相当之训练，儿童于精神上智力上加劳力体力上均发展得成健全之国民^[9]。教会利

用其广泛的网络和资源，为难民提供食物、衣物、医疗和临时住所。例如，天主教昆明教区在滇西地区设立了多个难民收容所，收容了数千名无家可归的难民。《滇西抗战时期教会救助档案》记载，1942年至1945年间，滇西地区的教会组织共发放救济粮约10万斤，衣物2万余件，为难民提供了重要的生活保障。此外，教会还开设了临时学校，为难民儿童提供教育服务。例如，大理地区的天主教会开设了一所难民学校，收容了200多名儿童，为他们提供基础教育和心理辅导。

3.3 国际援助的作用

一是联合国的前身——国际联盟的援助。虽然国际联盟在二战期间影响力有限，但其下属的卫生组织和难民机构仍为滇西地区提供了一定的援助。1943年，国际联盟通过其卫生组织向滇西地区捐赠了一批药品和医疗设备，用于支持当地的防疫工作。此外，国际联盟还通过其难民机构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滇西地区的难民问题，推动了更多援助资源的流入。

二是各外国政府的救助工作。美国、英国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盟友，在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42年，美国政府通过“租借法案”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，其中一部分被用于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。根据《美国对华援助档案》记载，1942年至1945年间，美国向滇西地区提供了超过500吨的粮食、药品和衣物，并通过飞虎队的运输机将这些物资运送到滇西各地。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机构和慈善团体，为滇西地区的难民救助提供了支持。1942年，英国红十字会向滇西地区捐赠了一批医疗物资和食品，并通过滇缅公路将这些物资运送到难民手中。还通过其驻昆明领事馆，协调当地教会组织和慈善团体，为难民提供临时住所和基本生活保障。部分海外华侨积极组织捐款、捐物的救援行动，为滇西地区的难民提供了大量支持。根据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工作报告》记载，1942年至1945年间，该组织共向滇西地区提供了价值超过500万元的援助物资，包括粮食、药品、衣物和建筑材料。

4 结论

抗战时期，国际社会的救助为滇西地区的难民提供了重要支持。抗战时期，滇西地区难民的救助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。政府通过设立收容所、发放救济

粮、提供医疗救助和生产自救等措施，试图缓解难民危机。然而，受战争环境和资源限制，救助工作的效果有限，难民的生存状况依然严峻。这一历史经验提醒我们，在面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，政府和社会需要更加高效地协调资源，采取综合措施，才能有效应对挑战，保障难民的基本生存权利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、外国政府和海外华侨团体的共同努力，缓解了难民的生活困境，挽救了无数生命。然而，受限于战争环境和资源条件，国际救助的效果也面临诸多挑战。这一历史经验表明，在面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，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。只有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，才能更有效地应对难民问题，保障难民的基本生存权利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正乾：《滇西历难》，中国铁路文艺，2005年第8期。
 - [2] 陈达：《现代中国人口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46页。
 - [3] 陆仰渊等编著：《民国社会经济史》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636页。
 - [4] 孙艳魁：《苦难的人流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48页。
 - [5] 《经济简报》，民国日报，1941年12月6日。
 - [6] 大理市志编辑委员会：《大理市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728页。
 - [7] 吴捷：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济与安置难民活动述论》，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5年。
 - [8] 陆卫先，杨文虎主编：《永昌府文征（第三册文录——为保山惨变乞赈通电）》，昆明：云南美术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086页。
 - [9] 云南省档案馆藏：云南民国政府档案，社会处，全宗号44，目录号4，案卷号144。
 - [10] 宋希濂：《鹰犬将军》，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58页。
- 基金项目：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1年，“民国时期云南农田水利建设研究”成果，编号：2021J1170。
- 作者简介：郭秀，(1985年—)女，陕西咸阳人，硕士研究生，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学院讲师，研究方向：中国近代云南地方史。